

根据地及根据地思想

让我们将讨论的重点从作家的态度重新转到常民的态度。水保渔民在进行抗争的时候，空间上始终没有脱离自己生业的所在，也即等身大的自然空间不知火海。与此相比，就竹内好所代表的作家们而言，无论他们身在何处，都可以继续从事文学创作这一职业，也即并不受农村或渔村等自然空间的束缚。在这一意义上，作家们带有难以摆脱的“流浪者”的性格。不过，“流浪者”们具有共同之处：他们拒绝抛弃自己等身大的生活而使空间意识迈入政治世界，也拒绝由此失去“内在常民”的世界。

话说回来，当原本属于非政治世界的常民踏入政治世界的时候，通常就会出现社会变革（包括革命）或战争，乃至民族主义的问题。

竹内好将20世纪前期的中国革命看成是以“农村根据地”为基础的常民革命，并表现出强烈的共鸣。他进一步认为，“根据地革命”中出现了一定的民族主义，而且那种民族主义并不是拥护国家权力的民族主义，而是朝向社会革命的民族主义。¹⁶关于这一点，菅孝行在研讨会上指出，竹内高度肯定中国革命的结果，造成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过度幻想，因而限制了他在文革爆发之后理应施加的批判，结果在面对文革后的中国时几乎陷入失语状态。

竹内好对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的根据地思想的确存在着幻想。他这样说：“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应该是根据地思想。根据地是一种继承了古代乌托邦传统的生活共同体，其发展源自它自身。过去的解放区如此，而全部变成了解放区的中国将成为世界和平与进步的根据地。”¹⁷他又指出：“在抵抗侵略的解放战争中，国家并没有成为防卫的目的，也没有成为防卫的动力源泉。……在解放战争中，日常性在革命的一方，而国家是无用的废物。……解放战争所需要的不是国家，而是根据地。”¹⁸

竹内好为什么会对中国农村根据地抱有如此

强烈的幻想呢？在19至20世纪中国社会大动乱的漩涡中，农民大众在面对农村崩溃的危机而决起时，他们的抵抗恰似水保渔民的抗争，始终没有离开村落这一生产生活的空间。他们所要保卫的不是别的，正是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空间，以及自己和村内同伴们的生命。因此，他们的抗战不是以国家防卫为目的的。事实上，国家对他们的抗战并没有任何形式的支援。正因如此，竹内好认为，对于抵抗侵略的解放战争来说，“国家是无用的废物。……需要的不是国家，而是根据地。”

竹内好对于中国的农民抗战的评价，与日本的中国现代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很不相同。后者的一般看法是，在1927年蒋介石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取得了北伐胜利，解决了军阀割据问题而实现全国统一之后，经过南京国民政府1928-1937年间的10年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族国家建设和国民的形成，由此成就了发动抗日战争的国家能力。而为了证明这一观点，较早展开了有关“现代国民市场”形成问题的经济分析。¹⁹他们认为，以日本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在强化了对中国的“半殖民地”侵略和统治的同时，通过扭曲的资本主义的渗透，加速了中国经济向资本主义的演变，形成了半殖民地性质的“官僚资本主义”，结果大致在1930年代出现了“现代国民经济”。²⁰

众所周知，民族国家的概念与欧美的“现代化”概念密切相关，是以民众对国家的归属意识确立为“国民意识”为前提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归属意识，意味着“国民”对于同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自觉。²¹从“民族国家”形成的观点来看，在1927年北伐之后，中国农民大众的抗战就成了基于“国民”意识而将南京国民政府和重庆国民政府看作是自己的国家、并将保卫国家当作最高目的的行为。而这一观点与前述竹内好的中国社会观截然相反。

类似的对立并不限于日本，在美国也同样能够看到。以作为日本问题专家比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更加著名的查尔曼斯·约翰逊为例，他在对以江苏省为中心的华中地区抗日运动的研究²²中认为，当1937年12月日本的中部支那派遣军占领了国民政

府首都南京之后，由于国民政府已经迁移到重庆，以南京和江苏省为中心的华中地区出现了政治真空（vacuum）状态。尽管华中地区一带的农民（1949年中国总人口为5亿4千万，其中农村人口为4亿8千万，占总人口的90%）已经对南京国民政府带有国民性的归属和认同意识，但南京政府的消失却导致农民的归属意识无从落脚，这就是约翰逊所称的“政治真空”。而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则趁机进入这一地区，进行势力扩张。促成新四军得以迅速壮大的，正是已具有明确“国民意识”的农民开始将新四军看作自己的政府军，对其抱有强烈的归属意识而大力支持的结果。在约翰逊看来，这一状况意味着新四军势力的扩大成了“天上掉下的馅饼”。概而言之，约翰逊认为，日军对南京的占领和对华中一带的军事统治，结果助长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地区的势力扩张。

要注意的是约翰逊使用的“农民民族主义”（Peasant nationalism）这一概念。这里的“民族主义”是在与“国民”意识密不可分，也即暗含着对“国家政治”的归属和认同的意义上使用的。但是，即便在当时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国民经济化”，农民大众立足于日常生活的非政治世界的意识，真地就那么容易在“无媒介”的情况下转变成国家民族主义吗？总之，从中可以看出与松下圭一和小林直树相同的“进步”史观，也即农民从非政治性的“大众”一跃成了政治世界的“市民”。

约翰逊之类的观点曾经长期在美国的中国学界居于支配地位，并对日本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而到了70年代初，马克·赛尔登在《延安革命》²³一书中开始对上述观点进行反驳。

赛尔登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势力扩张，绝非靠什么“天上掉馅饼”，而是来自于土地改革、干部和军官士兵下放到生产生活第一线、在大规模的劳动互助组织化基础上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以及“三三制”参议会选举和村落共同体的重建运动。但是，赛尔登的研究对象地区并非华中，而是西北的陕西、甘肃和宁夏的接壤地带，也即被称为陕甘宁边区的中共中央根据地。在考察30年代末期以

降的中国革命时，不应忽视西北比华中更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因为正如下面将要论述的那样，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势力能够进一步扩张的就不再是华中，而是西北地区的中央根据地。

1940年8月到12月，华北、西北地区的中共军队即八路军发动了对于日本北支那方面派遣军第一军的“百团大战”²⁴，并给予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这一事件改变了日军此前对八路军的轻视，为了消灭中共的军事力量，日军在山西境内沿黄河发动了由东向西的对陕甘宁边区和中央根据地的包围战。进而，国民党军队也趁机从南面拉开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网。结果，陕甘宁边区与外部的一切经济交易和物资流通被迫中断，从而出现了严重的物资匮乏和通货膨胀，而物价的飞涨导致边区经济濒临崩溃，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为了突破这种危机局面，中共开展了以土地改革、干部下放和大生产运动为主的村落共同体重建运动。其中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九旅1941年3月开始在南泥湾实施的垦荒运动以传说和神话的形式对农民大众造成了巨大影响。

赛尔登由此认为，西北地区农民大众的意识，并不是对于国家政府组织的归属之类的“国民”意识或国家防卫意识，而是避免战乱和灾害导致村落崩溃的村落防卫和生活防卫意识，而组织这一防卫战的正是中国共产党。概而言之，村落社会日常生活中以互助互惠习惯为基础的传统制度，如同在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时会凝聚集体的力量战胜危机一样，为了抵御外敌的侵略也会转变成一种动员、组织力量，而陕甘宁边区农民的抗战正是通过这种转变实施的。

以上论述说明，竹内好所说的“根据地思想”与赛尔登的“村落共同体重建运动”的观点几乎完全相同。从根本上说这正是常民的思想。竹内认为，根据地思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依然充满着活力，并向全国普及正。中国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以后推进的国家建设，所依靠的依然不是欧美的“民族国家”思想，而是根据地思想。在他看来，现代中国存在着这样一种常民，他们在不脱离以等

身大的日常生活为基础的非政治世界（根据地）的情况下，为保卫生活而走向政治世界，而毛泽东正是依靠这些常民来建设国家的。竹内好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幻想”正源于这一认识。

但问题在于，如同政治之于常民通常表现的那样，基于重建村落共同体这一根据地建设运动的“军事政治”，也正是“来自对方的政治”。具体说来，赛尔登所描述的30年代末到40年代前期的陕甘宁边区的农民，并不是自己主动地要求，而是被迫参加抗战这种军事政治的，也即当日本的侵略造成了对村落生活的威胁，他们不得不起而抗争。因此，他们在抗战的“政治”中也并没有离开作为生业之所的村落。如果说他们对于“政治”的忠诚确实起作用，那么这种忠诚并不是对国家的忠诚，而是对于自己所属村落的忠诚。

但是，在毛泽东的新中国诞生之后，要求农民大众参加的政治是否也属于“来自对方的政治”呢？比如，1953年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确可以看作“村落共同体重建”运动的延续，但却并不是在村落日常生活遭遇外部威胁而发自村庄内部的“抵抗”。因此，与陕甘宁边区时代的村落重建运动不同，农业合作化超越了自然村的范围，带有向国家层面扩大“升华”的可能性。从1953年的初级社到后来的高级社，在短短的5年间，农业合作化运动就在1958年远远超过自然村（二三百人）的范围而扩大到数万人规模的人民公社。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的国家所要求于农民大众的，并不是对其所属村庄的忠诚，而是对于国家的忠诚。而农民事实上也积极响应了这种要求。

问题在于，为什么生活于等身大的非政治世界的中国农民会如此轻易地被纳入国家政治？竹内对此并没有进行充分考察。甚至可以说，他可能不愿意相信中国农民发生了这种变化。菅孝行所说的他对于毛泽东的“幻想”可能也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因素。但谨慎说来，也许正是竹内好对于战后日本的强烈批判意识，导致了他对看上去与日本正相反的新中国和毛泽东抱有过大的期望，对此不应该加以忽视。

那么，生活于等身大的非政治世界的常民，超越抵抗的“政治”层面，为什么不是与国家相对抗，而是“升华”到了支持国家的政治世界了呢？这一点密切涉及下一节将要论述的竹内好仿效鲁迅而不断强调的一系列问题，也即“挣扎”、“在抵抗失败的同时抵抗对于失败的忘却”，以至通过此等方式的“觉悟到了失败的持续抵抗”。²⁵

关于“觉悟到了失败的持续抵抗”（下文简称“挣扎”）这一论点，孙歌在研讨会上强调它是重新评价竹内好时不可或缺的部分。我认为，孙歌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或许是因为认识到了这样一种状况：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毛泽东时代固然如此，直到改革开放实施后的今天的中国，尽管“挣扎”的重要性并没有降低而是在增大，但是却被遗忘了。²⁶

但无论怎样，如果竹内好能够将其有关“持续抵抗”的基本观点同样用来观察和思考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肯定就不会对毛泽东抱有那么强烈的幻想。关于他未能做到这一点的原因，将在下一节进行探讨。

[V]

东方主义与“内生性发展”： 关于失败的自觉问题

在18世纪迄今的所谓“近现代”历史中，将常民的等身大的生活加以破坏的，并由此招致常民抵抗的外部横压过来的“政治世界”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源于“欧美的现代”所特有的“自我实现和自我扩张”的军事政治力量。

在中国革命中，破坏农民大众的日常生活，是以日本为首的列强侵略和半殖民地统治压力，也即欧美的现代基于“自我扩张”的军事行动。进而，通过排放有毒废水而将水俣居民的日常生活加以破坏的新日本氮肥公司，也自然是遵循欧美式的现代化逻辑登场的“日本的现代”自我扩张的产物。同样的例子也见于东京的三里冢，为了建设成田国际